

试论蒋介石的“三上”、“三下”

张 珉

【内容提要】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派系复杂而又长期陷于派系斗争的政党。其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22年中“三上”“三下”为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的历史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轨迹。蒋介石“三上”“三下”，一方面出于他个人攫取党政大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其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背景。研究蒋介石“三上”“三下”的历史真相，对认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兴衰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蒋介石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在大陆统治二十二年零五天，中经三次上台，三次“下野”。蒋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年来，随着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改善，研究他的文章陆续刊登，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本文试就其“三上”、“三下”所反映的问题与历史趋势作以探讨。

(一)

蒋介石第一次上台与“下野”，同在1927年。蒋介石的上台，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确立其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新军阀统治，是当时诸因素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一，取得孙中山的信任，窃据军权是蒋上台的重要原因。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广州叛

⑤《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1930年3月)。

⑥⑦《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

⑧参见戴向青《论“二七”会议》、《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⑨总前委是1930年8月23日，一、三军团于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后成立，以前是红四军前委，本文根据这一时间，分别称之为红四军前委和总前委。

⑩毛泽东《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930年11月14日。

⑪《毛泽东同志给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夜于吉安城。

⑫《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0月7日。

⑬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党内政治斗争问题决议案》，1930年8月27日。

⑭《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

⑮⑯戴向青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

⑰宁都党史资料《黄陂肃反》第2页。

⑱《接受国际来信及四军全会决议的决议》1931年4月。

⑲《伟大的道路》第329页。

⑳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1931年12月5日

【作者简介】 武国有，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责任编辑 李景文)

变，围攻总统府，炮轰粤秀楼。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在敌人包围之下，处境极为困难。18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急电：“事紧急，盼速来”。29日，蒋从上海到广州，去永丰舰为孙中山当侍从。蒋此次应召，可谓“间关赴难”、“临危授命”。孙中山看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于侧”，^①对蒋寄以信任。1923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蒋为大本营上校参谋长，委以重任。

当着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时，蒋表示：“谁反对三大政策”，谁就是：以尊重总理以侮总理”，是“总理之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击之”。^②这样，蒋更加受到孙中山的器重，遂于1923年8月派出以蒋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访问。蒋访苏回国后，孙中山便于1924年5月3日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

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利用职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由此，窃据了北伐军总司令要职，握有军权，这是他第一次上台的关键。后来形成黄埔系，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派系，是蒋上台的主要支柱。

第二，江浙财团的支持，是蒋上台的极为重要条件。所谓江浙财团“是以上海为主要基地，以江浙籍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③。实际上，它是地主、官僚买办、金融巨头、工商实业家、青洪帮头子的混合物。主要代表人物有：虞洽卿、张家璠、张静江、钱新之、王正廷、陈其美等。蒋介石在发迹过程中同江浙财团结下了不解之缘。蒋是浙江奉化人，他同江浙财团中的许多头面人物“一直保持着重要的私人关系”。江浙财团经济实力之强，社会力量之大，在当时中国各大财团中独居鳌头。正因如此，江浙财团就成为蒋介石上台的重要财政支柱。

第三，上海的流氓势力，是蒋上台的得力帮凶。上海流氓势力主要是指在二十年代初上海法租界滋生的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首的流氓集团。他们依恃殖民当局为靠山，纠集地痞无赖，分业为霸，划地称王，从事各种黑社会勾当，而趋涣散、堕落的帮会也逐渐与之合流，遂形成拥有万千群众，几乎无处不能、无所不能的封建流氓集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得逞，不仅为

蒋上台实行独裁统治扫清道路，也使得上海流氓势力更加卖身投靠蒋介石，这就完成了中国会党史上一大转折。在此之后，上海流氓集团靠反共起家，黄、张、杜一变而为“党国新贵”、“地方政要”，成为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

1927年8月14日，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赫然刊出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位权倾沪宁，烜赫一时的“总司令”，上台仅三个月零二十五天，就“卸甲”下野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下野是在处境孤立，外攻内逼形势下，玩弄的以退待攻的政治赌博。蒋上台伊始成众矢之的。首先是遇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反抗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其次是国民党各派系的争权夺位，一时闹得蒋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这时有三个党中央：即武汉汪精卫集团的中央，南京蒋介石集团的中央，上海西山会议派的中央。他们为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存在尖锐的矛盾、激烈的对抗。特别是“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愈烈，因为，论资力，蒋比不过元老派胡汉民、林森、谭延闿等人；论军力，蒋比不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李济深等人，何况奉系军阀也在拭目以待。武汉分共后，汉方一些实力人物亦自恃分共有功，不买蒋的帐，扬言蒋不下台，“宁汉合作”无望。蒋亦看到宁汉相争，冯玉祥一直处于超然地位，如不“激流勇退”，大权可能旁落。蒋自知羽毛未丰，如“下野”，即能避开攻击锋芒，又可观战局外，待机而动，坐收渔利。于是8月13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宣布下野。

(二)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是1928年1月9日，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

蒋第一次下野是被迫的，是施展“以退为进”之策，伺机再起。为达目的，蒋下野后四下活动，为其重新上台创造条件。

第一，遥控政局。蒋虽子然下野，但仍能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政局。蒋下野后，蒋系以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一批文人和国民党要人声言与蒋“同进退、共沉浮”，为其复职周旋。宋子文、黄郛等在各帝国主义间、国内各派系间拉关

系、找靠山，蒋的上海一帮“小兄弟”还专充当坐探与打手，南京的班底仍是蒋家人马。陈果夫仍把持中央党部，上海买办，银行家一直支持蒋介石，蒋就通过他们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蒋虽身居雪窦寺，但他的魔影一时也没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由于蒋的遥控，党争激化，政局动乱，李、白的桂系，不但大权未握，连大局也难稳住。

第二，纵横捭阖。桂系势力的日益膨胀，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不满和攻讦。南京城里，尔虞我诈，乱成一团，这时局外观阵，欲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利用各派系矛盾，认为复职的最大障碍是“特委会”，蒋的权宜之策便是联汪反对“特委会”，于是12月13日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蒋支持汪反对“特委会”，汪推荐蒋复职。这时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要对奉张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要蒋出来“主张军事”。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复职的议题，决定蒋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委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被迫“出洋”。12月11日，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鉴于复职目的已达到，亦参与劫汪。汪也被迫“出洋”。蒋利用派系矛盾，用纵横捭阖手段，于1928年1月9日正式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委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要职握有党政军实权。蒋介石第二次上台。

第三，访问日本。正当桂系势力膨胀，各派系互相厮杀，争吵不休之际，蒋介石遂于1927年9月28日，偕张群、陈群等人，东渡日本访问。这次东渡有两个目的：一是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30日抵长崎，10月13日达东京。日本报界都以醒目标题登载蒋达日本的消息。

蒋在日本东京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接着，“他在东京有似强行军一般的访问活动”。^⑧蒋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相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诸次长南次郎等。同田中会谈时，田中表示，“对你的事业不惜充分之援助”^⑨

蒋介石在日本历经四十四天的访问后，于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快了复职的步伐。

第四，蒋宋联姻。蒋介石访问日本第二个目的，是拜见宋母，求得与宋美龄结婚。为此蒋曾于

10月3日偕宋子文到神户有马温泉“特地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太夫人，请其允许婚事。”^⑩终以蒋介石加入基督教，并与元配妻子毛福梅、侧室姚怡琴、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宋美龄与刘纪文断绝友谊之爱为条件，蒋宋婚姻成交。遂于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宋氏家族是受美国教育起家的。宋美龄其父宋耀如，早年在美国一所大学读神学，回国后在上海一个教会里当牧师。后来做进口机器的代理商，积累了巨财，成为中国上海的第一代买办。他的长子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是中国金融界的名流，小女宋美龄十一岁去美国留学，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大学，所谓最美国化的中国女人。孔祥熙是宋家快婿，中国的百万富翁。宋家与美国有不解之缘，通过宋家蒋可以和美国建立紧密联系。宋家在江浙财团中又有巨大影响，靠宋家蒋还可得到雄厚的财力支援。又因孙中山与宋家有姻缘关系，所以在蒋看来，同宋美龄结合，他可身价大增。正因如此，蒋介石就置“离婚再娶，弃妾新婚”大忌于不顾，而欣然入赘于宋家。

蒋宋联姻，不仅是蒋复职的重要因素，对蒋以后的政治生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后来一家报纸在报导蒋、宋结婚的消息时题目为《中美合作》，意为蒋中正与宋美龄的结合，又是中国与美国的联姻。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还不到四年，他的独裁统治便危机四伏，使他不得不宣布第二次下野。

第一，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不断发展，是他第二次下野的重要原因。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巩固最高统治地位，为此，极力抓党军两权。在军事上剥夺地方实力派的兵权，在政治上排斥异己，于是导致了各派矛盾的总爆发，反蒋运动由政治倒蒋推向军事倒蒋。但从1929年1月至1930年10月，蒋接连战胜对手，在他看来，环顾中华，主宰九州者，“舍我其谁也！”主张召开国民会议，重制新约法，妄图足登总统宝座，政治野心恶性膨胀。蒋的主张，立即遭到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于是蒋胡矛盾突出。

在蒋看来，胡汉民不驯，蒋当总统难成。于是，蒋于1931年2月28日晚，以宴请议事为名，骗胡至总司令部，将胡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胡案发

生,在国民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舆论界纷纷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反蒋各派也乘机举起反独裁、要民主的大旗。粤派要人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纷纷离南京去广州。汪精卫和邹鲁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四监委发出“弹劾蒋中正”电,令蒋立即“下野”,并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反蒋派于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任命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峙,从而形成斗争激烈的宁粤对立。28日非常会议发表《国民政府宣言》,声言蒋“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下野”。广州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两个集团军,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总司令,并在燕塘举行了阅兵式,宁粤双方剑拔弩张。各省地方军阀,也处于对战状态,伺机反蒋。蒋面对如此处境,不下野别无他路了。

第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和蒋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怒潮,动摇了蒋的统治地位。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向我国东北大举进攻,而蒋为了“剿共”及对付粤方反蒋势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屈辱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为挽救民族危亡。1932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宣战通电》,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东北,广大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军侵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京、上海等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出兵抗日。学生们在国民政府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钟长鸣,要蒋抗日。

在学生强烈要求抗日的同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杨杏佛、史量才等也批评蒋的不抵抗政策,要求一致对外,收复失地。东北军将领马占山1931年10月违抗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日,12月14日被蒋派往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全军举行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在各方反蒋势力的压力下,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于1931年12月15日批准了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总司令职务,蒋第二次下野。随后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举行四届一中全会,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三)

蒋介石的下野只是玩弄的缓兵计,正如他自己称下野是“负责任而进,负责任而退”之举。下野前就为重新上台作了准备,所以第二次下野四十四天后第三次上台。

第一,国民党四分五裂。国民政府改组,孙科执政,并非众望所归,而是蒋、汪、胡之间斗争的产物。蒋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攘利并未止息,在广州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与南京相对立,陈济棠在策动“西南五省大团结”,企图扩张地盘,何成浚又发起“九省联防”与陈对抗,张学良也纠合冯、阎在策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惯用纵横捭阖之计。他虽然下野,但仍是中政会常委,并于下野前夕改组了四个省政府,安插亲信。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这一人事任免使蒋得以控制江浙和首都南京,保证了下野后仍在这些地区的军政实力。

第二,孙科执政面临两大问题:“对日外交”和“财政危机”。对日外交,全国瞩目。虽然日军侵略气焰嚣张,但是人民的抗日运动不断高涨。孙科深知,蒋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抵抗政策”受到各界的反对,因而为取得人民的支持,主张“对日绝交、积极抵抗”,但“无绝交的办法、抵抗的措施,实际行动仍然是交涉,不抵抗。”^②于是,欲战不能,不战不和,进退两难,结果不仅没有收复失地,而且日寇却加紧进攻上海。最棘手的问题是财政危机。蒋下野后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部内职员被遣散,重要档案被带走,使财政部无法运转。新上任的财政部长黄新梁尽管千方百计搜刮民财,但每月的收入也只能有600万元,而每月军费开支就需1800万元,行政费每月400万元,

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巨。上海金融界又在蒋的授意下拒绝贷款。再加上各地的政客、军阀、党棍一齐伸手要官、要钱，弄得孙科政府一筹莫展。

在孙科政府无力支撑局面的情况下，国民党中政会被迫于1932年1月2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邀请蒋重返南京，共商大计。1月24日孙科辞职。1月28日，蒋回到南京主持临时中政会，决定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指定蒋为军委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统管全国军事。3月18日，蒋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这是他第三次上台。

当上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十七年后，于1949年1月21日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是蒋统治大陆二十二年的第三次下野。至于蒋为何“引退”？他在下野宣言中说：“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这便是蒋此次下野的原因所至。

第一，军事上全线溃败。到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还进行了战略决战，共歼敌418万余人；东北，华北全境解放，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支柱——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占其第一线兵力的百分之九十被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蒋家王朝已处风雨飘摇中。

第二，政治上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郑重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伪国大、伪宪法，使蒋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同时，蒋为支付巨额军政费用无止境地印制钞票，使全国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国民党在经济上已面临崩溃。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5月发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立即得到民盟、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欢迎，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至此，蒋已成为孤家寡人。

第三，外交上处于绝境。早在1948年10月，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企图另换工具。11月16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长，司徒雷登向孙表示美国态度“欲实现国共和谈，非蒋去职不可”。美国主子变

脸，蒋焦急不安，遂于11月28日派夫人宋美龄访美求援，结果一无所获，表明美国决心换马。1949年1月8日，蒋还授意外交部长吴铁成照会苏、美、英、法四国驻华大使，恳请四国政府协助完成国共“和谈”，均遭拒绝。至此，在外交方面，蒋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处于绝境。

第四，桂系发起逼蒋下野攻势。1948年12月24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发出“亥敬”电，要“蒋下野”；12月30日，白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在淮海战役吃紧，杜聿明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待歼之际，蒋急调宋希濂部来徐州增援，但遭到白崇禧的阻拦。程潜、张轸、李宗仁明确提出要蒋“下野”，以换危局。桂系在美国支持下发起逼蒋下野的攻势下，蒋不得不于1949年1月1日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在继续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条件下愿意与共产党恢复和谈，并表示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示意可退。

第五，和平阴谋的破产。在蒋家王朝面临覆灭而又玩弄“和平”阴谋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并引用了古代希腊农夫救蛇的寓言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真正的民主党派牢记农夫的教训，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将革命进行到底。14日，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毛泽东的声明，给蒋的“和平”阴谋以致命打击。至此，蒋面对战不胜、“谈”不可、骗不逞的败势，无奈于1月21日发表“引退”文告，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蒋介石第三次下台。

综上所述，蒋介石三次上台与三次下野的历史，可得如下几点看法：

一、蒋之所以上台又下野，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并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害，即都反对中国革命。从这点出发，他们有时称兄道弟握手言欢，杯酒释兵，合伙反共；然而，他们又有不同的利害，即都想称王中国为己任，国无二主，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格言。从这点出发，他们又争权攘利，甚至刀兵相见，战争不已。二是帝国主义之间争相

侵略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寻找代理人充当工具已是惯技，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以后，他们又物色新军阀充当代理人。为此，蒋每次上台或下台，都离不开帝国主义的魔影。三是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国民党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部分国民党的在野派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攻击在朝派企图取而代之。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造成蒋不可能始终在台上的重要原因。

二、蒋在国民党各派系斗争中屡战不败，长期在台上；反蒋派屡战不胜，即便是上台也是短命的。由于蒋先后受过封建主义的教育，日本军国主义的栽培，上海流氓买办黑社会的陶冶，资产阶级民主的熏染，又有投机革命的政治生涯，他又对从孔夫子到耶稣，从日本天皇到希特勒，从孙中山到基马尔，从华盛顿到曾国藩，从封建行帮到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共产党他都揣摩过，复杂的思想和经历，使他具有多变的脸谱和善用权术的惯技，成为帝、封、官理想的代理人。而反蒋派，在政治上没

正确的主张，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又不能与蒋相对抗。他们用资产阶级改良主张当作反蒋武器，事实证明必败无疑。他们的反蒋斗争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靠投机，昙花一现。国民党内部发起的反蒋斗争，既不能取胜，也没有什么进步意义。

三、反共反人民的人，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的结论。蒋虽然在第一次革命前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些联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但观其一生，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第一次下野前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下野后又和国民党各派、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一致反共”；第二次下野前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反动“围剿”上台后又进行第四次、第五次“围剿”，使红军被迫长征；第三次下野前又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反共内战，到台湾后仍坚持“消灭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与人民顽抗到底。蒋终于在1975年4月5日客逝于台湾。“历史证明，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的统治，无论施展多少政治权术，有多大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最终只能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⑨

注释：

- ①《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
- ②③④转引荣孟源：《蒋家王朝》第18、37、39页。
- ⑤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746—767页。
- ⑥⑦《外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期第213页。
- ⑧《上海钱庄史料》第207页。
- ⑨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12页。
- ⑩转引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第70页。
- 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第一分册，

第148—149页。

⑫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第17页。

⑬转引自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1年第7期，第223页。

【作者简介】 张珉，男，58岁，现任四平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景文）